

## 老英雄(小说)

● 郭光林

那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故事。那年,我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里求学,我是桥梁设计系的一名大二学生。

这座大学很大,像座古建筑式公园,进入学院大门,很远就能眺望到广场中央的一座巨大的毛泽东主席花岗岩塑像。每天早课时分,我经过第二教室楼去上大课,便会看见一位老大爷,戴了顶陈旧的草帽,佝偻着背,一笔一划地清扫着塑像座基周围的落叶,就像一位小学生在学书法,认真而生疏。

老人戴着草帽,看不见他的脸庞,但从他的身材估计,是个高个子。我听管宿舍的阿姨说,这老头是学院总务科招来的清扫卫生的临时工,工资每天一结,二元五角。但老头很怪,平时话很少,可干起活来不要命,什么脏活累活,他都抢着干。

老头到了大学之后,学院的卫生面貌大有改观,许多卫生死角,都被他一个人悄悄地消灭了。就连和他一起干活的同伴,也看不懂,他如此卖力地干活,图什么?

我想老头可能家庭困难,想多赚点钱,所以才拼命地干活。因此,我就把平时的生活废旧品,都捆扎好,放在毛主席塑像基座的边上,让老头回收,给他多赚些外快钱。我也没有和他说过话,跟一个扫垃圾的老头有什么话可以多说的呢?真像谜一样的老头,每天,只会弯着腰埋头扫地。

父亲突然打电话给我,叫我回趟老家,我知道,父亲没有什么大事,也不会轻易召唤我回家的。我连夜坐上火车,赶

回了老家。

半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,他瘦了许多,好在精神还可以。父亲是位严肃内向的人,就像大多数中国式家庭的“严父慈母”。父亲这次一改常态,把我引进了他的书房后,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说了许多话。

在谈话就要结束时,父亲从床底下,拖出一只旧皮箱子,用颤抖的手,将皮箱打开了,父亲在箱底抽出了一个布包,小心翼翼地打开了,哇,这么多的军功章,还有多张发黄的老照片,父亲拿起一张照片上四位穿着志愿军军服合影的战友相片,对我说,这是爸爸跨过鸭绿江时和团长黄振山及二位战友一起照的像,那时,我在团部担任参谋。他指了指照片中的高个子说,这个就是我当年的团长,也是我的人党介绍人,我那时长得瘦小,人特机灵,团长管我叫“小猴子”,我俩是好哥们!

父亲平复了一下语气,又接着说,在入朝第二次战役中,我被炮弹震昏了,到我醒来时,我成了美军的俘虏。从此之后,我再也没有联系上了老团长!

我最大的遗憾,便是没有找到这些老战友,你这次回上海,帮我寻找一下,据说,我的老部队有部分干部归国后,在上海工作。父亲说完,将一本破旧的日记本递给了我,这里面记着我的老部队的番号和战斗日志。父亲说完这些话,感觉有些累了,就对我说,我先休息一会儿,找你妈妈去聊聊天,我想睡觉了。

回到学院后,我一头扎在父亲的那本日记本上,一连五个晚上,我都拔不出来,没想到父亲这位瘦小文弱的会计,竟有如此壮烈的事迹。有些精彩的战斗段落,我都能熟练地背出来了。

我把父亲与战友的合影照反反复复地看个不停,平时,喜欢美术的我,对人脸观察得特别仔细,竟然发现了黄振山的眉宇与眼帘之间有一粒黑痣。我把那张照片和军功章及日记本,珍藏在书包里,没事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。

三个月之后,父亲患肝癌去世了,我心中的大树倒了!

到年底,学院照例要召开“先进教职员工表彰大会”,我是校报特邀记者,脖子上挂着照相机,跑前跑后地抢镜头。

表彰大会开得很隆重,校党委书记徐海鸣亲自主持了大会。大会将要结束时,徐书记站起身,对着话筒大声说道,今天,我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,他就是我们的老英雄,离休干部黄振山同志,在抗美援朝时期,他就是我们英雄团的团长,离休后,隐姓埋名来到我们大学,做了一名扫垃圾的清洁工,下面有请我们的老英雄上台,为我们作报告!

掌声响起,只见一位身穿65式军装的老军人,健步跨上主席台,他走到台中央,一个转身立正,向观众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在台下抢拍照片的我,听到了黄振山这个熟悉的名字,我的脑袋一阵阵发热,黄振山!这不是父亲要寻找的老团长,我仰望台上的黄振山,发现他的眉宇与眼帘之间也有一粒黑痣,我立即从书包里掏出那张合影照,细心对照了一下,对!就是我父亲要找的那位老团长黄振山!

我将发烫的头脑冷静一下之后,飞快地写了一张条子,请工作人员递上台转交给了黄振山。黄振山停顿了讲话,片刻,他又响亮说道,刚才有个同学传纸条上来问,我抗美援朝时,是哪个英雄团,我现在就可以回答那位同学,我是XX军XXX师XXX团!

老英雄话音未落,我热血沸腾,一个翻越窜上主席台,箭步立正在老英雄面前,大声喊道,报告!中国人民志愿军XX军XXX师XXX团参谋范敬标之子范正,向团长黄振山报到!

范敬标? / 是!小猴子!我叫出了父亲的绰号。 / 像,太像了,你,是小猴子的儿子? / 是 / 你爸爸怎么没来? / 我爸爸去世了!

我从书包里掏出照片和军功章及日记本,双手呈给了黄振山。黄振山接过军功章,一一把它佩戴在我的胸前。老英雄一把将我拥在怀里,我俩嚎啕大哭起来。

一年之后,我成为了西部地区某部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战士。

## “双减” ● 海巴子

眼下的教育“双减”话题,热得发烫。其实针对孩子的教育,无非来自两个方面,一是父母,二是学校。

先说父母。社会上早就有一个说法:“第一次当父母,都没有任何经验”。所以,为人父母,失败与否跟经验是有关的。

然而,假如反过来,它的逻辑就是:凡是第一次,出了错就可以原谅。但是,针对这种谬论,我的反驳是:你当过几次爹妈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你曾经当过一次孩子!

试想,今天的父母们,谁没有当过孩子?我们知道孩子的缺点,也知道孩子的期待,我们知道孩子的处境,也知道孩子的需要。所以,有些人说自己不会当父母,那是借口,他们明明知道孩子的需求,但他就是蛮横地不予理睬!

这个逻辑,其实是可以推导出一切社会关系上。你可以没有当过领导,但你在当领导之前,你一定在底层的某个位置上,其实你是知道底层的人需要什么。如果不能给,那不是缺少培训和学习,那只是因为缺乏同理心。而在这方面,再多的劝诫和培训都是无效的。

再说学校。当今的教育学术界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人人都认为今天的教育肯定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。其实,教育焦虑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的问题。美国社会学家兰德·柯林斯发明了一个概念,叫做“文凭通货膨胀”,它直指向了问题的症结。

人为什么希望受到更高更好的教育?表面的理由是:为了获得更高的工作技能。教育过剩,直接原因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技能,很少是在学校里学到的。很多职场年轻人走上岗位的第一步,就是要学会基本的工作技能;因此,就大部分情况而言,大学的真正用处,并不是培养技能,而是发放文凭。柯林斯观点由此而产生:人们是想凭借文凭的优势摆脱体力劳动,进入脑力劳动这种比较清闲的工作。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洞察。

那么,问题来了。人们恐惧体力劳动,希望从事脑力劳动,这其实是工业时代留给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凡是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,脑力劳动有它的艰辛不易,体力劳动也有它的幸福快乐,如果将来这两种劳动收入差距再缩小,那普遍的教育焦虑问题,是不是就能缓解一点呢?



## 桂志苑

刊头书法 沈爱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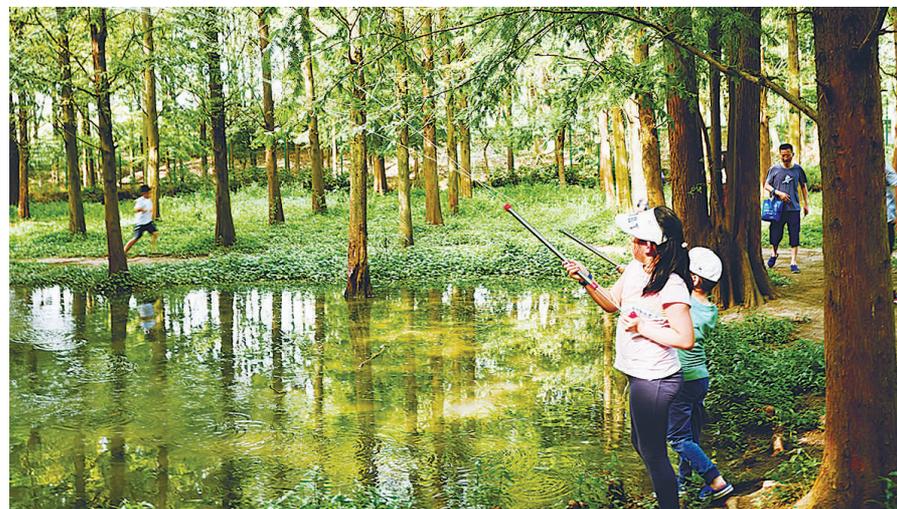
## 岳阳路190号

● 吴道富

入夏,步入徐汇区岳阳路,大树漏下斑驳碎影,你会顿觉清凉起来,一眼望去,街上建筑各具特色,无不给人整洁、高雅、静谧、迷醉之感……

我伫立于190号门前,凝视铜牌上铭刻的文字:霖生医院旧址 / 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 / 建于1920年,英国式住宅建筑,由名医生惠霖、牛惠生兄弟创办,淞沪抗战期间,宋庆龄、何香凝等曾在此组织战地救护。 /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立 / 2010年11月。缘何情系于此?盖因家父吴子珪(毕业于杭州广济医学院,后来沪师从牛氏昆仲)曾在此短暂服务过,并说起过这里的故事,怎不令吾观望良久、感慨系之哦。

牛惠霖、牛惠生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,再分赴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深造,皆荣获医学博士学位。回沪后,兄弟合办“霖生医院”,旧址即在今岳阳路190号。这是一幢三层砖混结构大型花园住宅,现已修葺一新,双坡屋顶陡峭,奶色外墙醒目,保留着1920年建筑时的风貌,



■ 悠闲(摄影)

罗时琮

被列为国家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。牛氏兄弟乐善好施,医院门口时有乞丐,他们常把挂号费分给他们。1927年10月的一天,接到一位腿中三枪、胫骨腓骨全打断的重伤者,诊断发现虽先接骨但却接歪,通常需截肢,然他们非常理解伤者的心情,尽心医治保住了这位革命志士的伤

腿,使他重返战场。原来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赓同志,多年后,陈赓仍念念不忘牛氏兄弟对革命者的同情之心和超高医术。淞沪抗战时,牛氏兄弟和宋庆龄、何香凝一起积极组织救治伤员,备受各界赞誉。据牛惠霖女儿牛恩美回忆:凡是宋庆龄托他们照顾的病人,无不受到悉心诊

治,有几次为掩护共产党员出院,父亲还会回家向母亲要便服给愈者换装,并送上路费……

牛惠霖医生1924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五任会长,被尊为“中国医界之柱石”。牛氏昆仲,医界巨擘,所作善举,永载史册,岳阳路190号铭记着!